

发展过程中的社会景气与社会信心*

——概念、量表与指数构建

张彦 魏钦恭 李汉林

摘要：通过社会景气与社会信心两项表征民众“总体性情绪”的社会事实，可以观测与分析一个社会发展的总体状况和运行态势，以“晴雨表”的方式反映和把握社会发展的“脉搏”。在制作测量与观测工具的基础上，通过全国性抽样调查数据进行检验的结果表明，研究所设计的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在此基础上，社会景气与社会信心指数可以用一种基于变量正态标准化转换和量纲统一的方法构建。数据统计结果显示，以2012年为基点，2013年和2014年中国的社会景气与社会信心指数呈现稳步上升的态势。

关键词：社会发展 社会景气 社会信心 微观—宏观分析

作者张彦，西南大学文化与社会发展学院讲师（重庆 400715）；魏钦恭，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助理研究员（北京 100732）；李汉林，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北京 100732）。

如何在宏观与微观的结合上把握中国社会发展的形势，分析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对于国家当前与今后的发展至关重要。多年来，我们尝试系统地从理论与方法的结合上研究社会的总体发展状况。本文期望通过对“社会景气”与“社会信心”的研究，使人们能够较为准确地把握社会变迁与发展的形势，从而使理论研究以及政策制定有一个全面、可靠的数据基础。

在这里，文章试图探讨从人们微观层次的主观感受与态度出发来观察与分析宏观社会事实的可能性，以从根本上理解社会景气与社会信心研究的可行性及其意义，推进这项研究的深入。

* 本研究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发展过程中的社会景气与社会信心研究”（项目编号：14ASH013）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市场化进程中的结构紧张与相对剥夺感研究”（项目编号：13CSH024）的阶段性成果。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夏传玲研究员在方法上所提供的帮助和匿名评审专家对文章提出的富有建设性的修改意见。文责自负。

首先，我们将分析微观个体态度与宏观社会事实之间的勾连；然后从理论与方法的结合上探讨社会景气与社会信心的界定与理解，研究社会景气与社会信心的操作化与测量；在此基础上，通过一项全国性的调查数据来检验有关“社会景气”与“社会信心”的测量指标及量表的信度与效度，并试图提出一种基于变量正态标准化转换和量纲统一的指数构建方法。

一、微观态度与宏观社会事实：方法论基础

在过去，多数研究主要是从科学抽样方法论的角度，来解释人们为什么能够通过分析个体被访者的社会感受与社会态度去推论、分析与研究一个时期社会中的宏观社会状况。但是，这种解释却没有令人信服地揭示出微观社会态度与宏观社会事实之间的勾连以及形成这种勾连的条件和机制。原因在于基于大规模问卷调查的社会态度与社会感受的研究，往往缺乏一种强有力的学理支撑，从而陷入微观向宏观跃迁的解释困境。

分析微观感受与宏观社会事实之间的关系，首先需要区分个体与社会两个层次的心理。对于每个受访者而言，其所表达的主观态度及行为意愿是以题器内容为指涉对象的。譬如，某一受访者对收入状况不满意，只能将其不满意聚焦于收入状况，却很难追溯其不满意的准确原因。按照问卷调查方法的要求，人们只需要受访者将关于某事项的主观态度表达出来即可。这样不仅能够避免先入为主地规定人们感受的原因动机，而且还可以客观地记录受访者的纯粹主观感受。^①在个体问卷回答的基础上，通过一定方式的数据统计所反映出来的总体性情绪（aggregated mood）具有与个体社会态度不同的特征。首先，二者属性不同，即总体性社会心理有可能与个体的社会态度相一致，也可能相冲突。总体性社会心理只关注群体或社会总体层面的大规模社会现象，而不解释单个个体的行为意愿与态度取向，最终个体层次的变异性被总体的一致性或群体的差异性所代替。其次，二者生成机制不同。社会心态并非个体心态的简单叠加，而是通过社会认同、情绪感染、去个性化等机制新生成的具有本身特质和功能的心理现象，反映了个体与宏观社会在心理意义上的连结与相互构建。^②

从涂尔干关于个人意识与集体意识关系的论述中，可以清晰地发现个体心理与社会心理之间的殊同，“毫无疑问，如果没有个人意识，任何集体生活都不可能产

① 李汉林、渠敬东：《中国单位组织变迁过程中的失范效应》，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0—42页。

② 杨宜音：《个体与宏观社会的心理关系：社会心态概念的界定》，《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4期。

生,但仅有这个必要条件是不够的,还必须把个人意识结合或化合起来……个人的精神在相互结合、相互渗透和相互融合的过程中产生一种存在,说这种存在是心理的存在亦可,但它具有一种新的心理个性。”^①这也就是说,在个体意识与集体意识之间存在着一个转换机制,这就是涂尔干一再强调的化合作用。这种化合作用发生在所有个体存在的场域中,因场域和化合方式的不同,所产生的新的心理个性也随之不同。正如勒庞笔下的“暴民”一样,原本理性、有教养的个体,一旦聚到一起,随着聚众规模的增大,就会相互影响,使得本不一致的个体在行为和观念上趋于一致,变得非常不理性、冲动、偏执和激进。^②在涂尔干的理论视域中,^③这些体现在个体身上但又表现为某种范围和程度上的总体性心理是外在于社会个体,并对社会个体具有约束作用的社会事实。同样的道理,我们不能因为总体性的社会心理与个体性的态度取向层次有别或方向相左就否认其存在。虽然就单个受访者而言,其社会态度是主观感知的表达并具有个体异质性,但在抽样总体中反映出来的则是一种总体性社会心理。

与涂尔干所提出的“化合作用”这种虽普遍存在但却无法道明的“突生作用”相比,同样是为了应对微观与宏观勾连的解释困境,赫斯特罗姆(Peter Hedström)提出了“解析社会”的观点。^④这种观点不仅在理论和方法上对微观与宏观之间的关系机制进行了解释,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被人们长期悬置的“突生作用”在无法解释之时只能被归因为非意图性后果的无奈。简单概述,“解析社会”的分析路径,从个体行动发生的原因出发,强调只有具有目的性的行为才能被看作是行动。只有个体的行为能够被期望、信念和机会解释时,才是一种行动。他的“解析社会”理论被称为“DBO理论”。在明确了个体行动的原因之后,赫氏进一步指出,只有解释目的性行动之间的社会互动,才能洞察个体行动与群体行为之间的关联,社会互动及其背后的因果机制才能构成从微观行动向群体行为跃迁的基础。由此,我们才可以理解从个体行动到群体行为趋同的发生机制,并实现从微观行动向宏观现象的逻辑解释。^⑤

解析社会的分析视角回避对个人行动的类型学解释,直接从个人行动的原因,

-
- ① E.迪尔凯姆:《社会学方法的准则》,狄玉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119页。
② 参见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冯克利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
③ E.迪尔凯姆:《社会学方法的准则》,第119页。
④ Peter Hedström, *Dissecting the Social: On the Principles of Analytical Sociolog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38.
⑤ Peter Hedström, *Dissecting the Social: On the Principles of Analytical Sociology*, pp.40-45; James S. Coleman, “Social Theory, Social Research, and a Theory of Ac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91, no.6, 1986, pp.1309-1335.

也即从最微观的层次上分析个体行动得以产生的根源。在个体行动的基础上,通过转换机制,从成员间的社会互动出发,论证个体行动对他人产生的影响。在互动机制效应的作用下,不仅可以产生群体内的行为趋同,而且,此时相对于最初的个体行动,他人的行动以及由此形成的外部结构环境进一步影响和制约着个体行动。这样,“DBO理论”既秉持了韦伯关于社会行动可解释的传统,又否定社会现象是个体行为简单叠加的个体还原论;既拒绝把社会当作完全外在于个体的客观结构,又解释了涂尔干关于个体意识向集体意识转换的化合机制理论。

虽然人们的主观态度并不与其社会行动相一致,但这种在个体态度基础上化合而成的总体性社会心理是一种超越个体心理的社会事实。而要实现从微观态度向宏观社会事实的解释,就必须也只能从这种关系背后的逻辑机制中去找寻。结合社会调查数据和统计分析,总体性的社会心理并不是受访者的主观态度在统计数据上的某种累加。更多的常常是,在预先的假设和理论上,通过一定的统计方式推导出来的有关总体性社会心理的特征与趋势。如何能通过可信、有效的题器进行测量并加以解释,就构成了研究能否成功的关键步骤。

社会层面的心理特征是一种社会事实,不同于自然事实,是社会行动者通过某种方式建构而成的。^①对总体性社会态度的解释须到个体层级中去找寻,因为没有个体基础,这种超越个体的社会事实便无从形成。^②但这不是一种个体还原主义,相反,任何社会事实如果不能从个体的行动和观念中加以观测和操作,就只不过是某些臆构的空泛概念而已。

二、社会景气与社会信心

对社会发展状况的观测与分析,一方面要从社会的视角出发,在某些关键事实基础上对社会发展变迁的总体状况与态势进行审视;另一方面,要强调经济与社会之间的内在关系、两者之间的协同变化以及总体性的经济社会结构特征。目前,我国社会正处在快速转型时期,在此阶段,各种深层次社会问题凸显,新出现的问题与原有的社会问题交织在一起,使社会的系统性风险加大,脆弱性加剧,

① 刘玉能、杨维灵:《社会行动的意外后果:一个理论简史》,《浙江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

② 赫斯特罗姆在阐述由个体行动到集体行为时,引用了福多尔关于“多层”解释的逻辑,即群体特性,必须要到其低一层的运行机制中去找寻原因。(参见 Peter Hedström, *Dissecting the Social: On the Principles of Analytical Sociology*, p. 34) 这种多层逻辑事实上本身就是一个操作化的过程,即将那些我们无法用经验加以描述与解释清楚的事实操作化到可以观测与解释的层面。

并隐含各种潜在的发展风险,制约着经济社会的总体发展。^①同时,改革以来,在由总体性社会向分化性社会转变的过程中,由于社会结构的分化速度快于制度规范的整合速度,导致整体性社会结构的紧张趋势。^②因此,通过科学有效的方法,抓住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某些关键事实对总体性社会问题进行分析,对于有效应对社会转型过程中一些显现或潜在的经济社会风险以及化解社会结构紧张的危机都具有重要意义。

在国际上,自2009年开始,欧盟委员会每年对其成员国进行社会环境状况的调查与监测,报告总体的社会发展程度与各成员国的社会环境状况。^③这项被称之为“欧洲晴雨表”的调查研究,设计出了一套题器去分析民众对以下三个方面的满意度,包括:个体状况;各成员国的经济状况和社会经济环境;社会政策状况。对于每个方面,受访者需要从当下情境、以往经历和未来预期进行评判。这项研究的目的是通过一套主观指标来评估社会发展程度,其研究逻辑建立在认为社会环境是一个社会的总体性情绪基础之上,类似于“天气状况”或者“气温变化”,是能够通过人们对某些事项的主观感受反映出来的。^④

欧盟关于社会发展晴雨表的研究是一项前沿性工作,对我们的研究具有启发意义,但也留下不少改进的余地。其主要不足之处:一是偏重对调查数据的解读性描述,缺少对事物之间因果逻辑的解释性阐述。从相关研究报告可以发现,其更多的是关于变量的频数描述和相关分析。虽然他们力图比较各年份的变化及各成员国之间的差异,但我们仍很难从中获得这种变化及差异的内在机制与因果逻辑,而这对于解决某些问题的政策制定尤为重要。诸如不同年龄、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社会发展与社会态度研究”课题组:《社会发展的四个理念》,李汉林主编:《社会发展研究》第1期,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4页。

② 李汉林、魏钦恭、张彦:《社会变迁过程中的结构紧张》,《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2期。

③ European Commission, *Special Eurobarometer 315: Social Climate 2009, Report*, 2010, http://ec.europa.eu/public_opinion/archives/ebs/ebs_315_en.pdf; European Commission, *Special Eurobarometer 349: Social Climate 2010, Report*, 2011, http://ec.europa.eu/public_opinion/archives/ebs/ebs_349_en.pdf; European Commission, *Special Eurobarometer 370: Social Climate 2010, Report*, 2011, http://ec.europa.eu/public_opinion/archives/ebs/ebs_370_en.pdf; European Commission, *Special Eurobarometer 391: Social Climate 2011, Report*, 2012, http://ec.europa.eu/public_opinion/archives/ebs/ebs_391_en.pdf; European Commission, *Special Eurobarometer 408: Social Climate 2012, Report*, 2013, http://ec.europa.eu/public_opinion/archives/ebs/ebs_408_en.pdf.

④ European Commission, *Developing and Testing a New Measure of Social Climate*, 2010, <http://ec.europa.eu/social/BlobServlet?docId=6723&langId=en>.

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等社会人口学变量上的主观态度差异只能给人表面的印象，却不能提供更加深入的信息。这一缺陷不仅由于研究者忽视了社会研究对事物之间因果机制发掘的重要性，更因为忽视了对宏观结构因素的考察，使变量之间的分析难以完成更为深入的解释性阐述。二是量表和指标在构建的过程中缺乏理论上的逻辑性和方法上的严密性。研究所提出的社会状况（social situation）概念只是对其简单的界定，缺乏理论基础。由此导致的一个后果便是在概念的操作化过程中，指标的选择没有理论依据，容易陷入循环解释。从方法论上看，一个“成功”且“有用的”量表和指数的主要标志是简单、敏感和便于操作。^① 反观欧盟的研究，既没有对指标的信度、效度和精度的测量，也没有对指数的构建给予充分的说明。

基于上述研究，本文试图结合中国国情，提出用以观测一个社会发展状况的理论概念及测量指标，阐述概念形成和指标测量的理论逻辑。

（一）理论概念

在对国外发展理论进行梳理及总结国内改革开放以来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我们将社会发展的理念归纳为致力于人民福祉、社会公平、社会包容、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路径和模式。^② 我们试图通过分析人们对其所处社会环境的主观感受，即通过观察人们的社会态度来探讨和把握社会发展的状况。

在一般意义上可以假定，人们的主观感受能够反映出一个社会的客观现实；人们主观感受到的客观现实能够反映出一个国家社会治理的水平和社会发展的程度。由此可以判断，一个发展状况良好的社会应是一个景气的社会，也是人们对未来有着良好预期与信心的社会。在此基础上，我们试图通过“社会景气”与“社会信心”这两个概念来对社会发展的现状与趋势进行概括。如果说，一个社会是否良性运行与稳健发展能够从某些社会事实层面进行评估与判断，那么对“社会景气”与“社会信心”状况的研究旨在把握社会发展脉搏，以“晴雨表”的方式反映社会发展状况。虽然社会景气与社会信心是人们某种主观态度的总体性体现，但反映的是整个社会结构是否整合有序、整个社会环境是否安定团结、整个社会方向是否顺应民意。^③

从理论上说，社会景气主要是指人们对其当下所处社会环境的一种主观感受。

① Li Hanlin et al., "Searching for Hidden Reality: Anomie and Social Change," Swiss Academy of Development, Internal Research Report, 1998.

②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社会发展与社会态度研究”课题组：《社会发展的四个理念》，第3—19页。

③ 李汉林主编：《中国社会发展年度报告（2013）》，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27页。

即指不同社会群体对自身福祉提升与否、在与不同群体社会互动过程中社会包容状况改善与否以及对政府制度安排实践公平正义与否的评价。社会信心则主要是指人们对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形势等社会事项以及个体的发展机会、收入状况等个体事项的未来预期与判断。^①事实上,这两个概念暗合的是前文所述的有关社会发展理念的四个方面:社会景气概念指涉的是社会福祉、社会公平和社会包容状况,而社会信心概念则指涉的是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

目前,国家对经济形势的研判已经有一套较为完备的理论和观测体系,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每月都发布国家的经济状况景气指数。^②与之相比,对社会发展状况的监测还没有专门机构来进行研究。这一方面是因为对社会发展状况的监测难度大、涉及面广、数据较难收集;另一方面也可能与重经济增长、轻社会发展的理念有关。而作为“晴雨表”的社会景气与社会信心研究不仅可以为判断社会发展形势积累更丰富的数据资料,而且也能够与经济景气指数“相得益彰”,为更加全面地把握国家经济社会运行状况以及政策制定提供一个全面、可靠的事实基础。

(二) 操作化与微观逻辑机制

确定了社会景气与社会信心这两个分析概念之后,一个重要的研究任务就是要对其进行操作化。这种操作化尝试有两条路径。第一条路径是从理论演绎出发,探寻涵盖性较强的指涉概念;第二条路径则是探寻受访者对理论概念所指涉的社会现象进行感知与评判的逻辑机制。前者强调理论的一致性,后者则强调解释的微观基础。只有这两条路径贯通契合,研究才具有完整性,才能避免理论概括与微观阐释的偏颇。

从理论演绎的角度出发,并结合有关社会发展的四个理念,我们将“社会景气”操作化为满意度、相对剥夺感和对政府的信任度三个方面。其中满意度不仅指涉民众的社会福祉状况,如个人收入水平、住房状况、健康状况、发展机会等个体事项和食品安全、环境质量、医疗服务水平等社会事项,同时还包括了解人们对社会公平公正状况的感受。相对剥夺感测量的主要是人们在与参照群体比较过程中对自身经济社会地位得失变化的感受,包括社会公平状况和社会包容程度。在发展的过程中,政府及政府行为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政府的制度安排不仅影响着社会公平

① 李汉林、魏钦恭:《社会景气与社会信心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12—15页。

② 参见张永军:《经济景气计量分析方法与应用研究》,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7年;郑桂环等:《经济景气分析方法》,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年;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http://www.cemac.org.cn/>)。

的实现和民众社会福祉的提升，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的包容性发展起到引导和促进作用。在一定的意义上，人们对政府的信任程度既反映了政府在推动国家发展过程中的成绩和效率，同时又影响着人们对社会发展其他方面的判断与感受。三者各有侧重点，且相互交织。“社会信心”则被操作化为民众对未来有关社会福祉、社会公平、社会包容状况的发展预期，这是社会能否可持续发展的民众信心基础，包括对社会总体事项的信心度和对个体事项的信心度。按照受访者评判的对象层次和评判时点，四个方面的关系可表示如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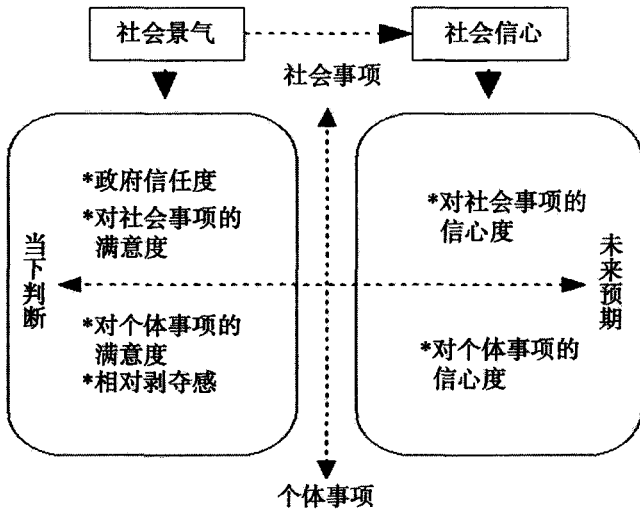


图 1 社会景气与社会信心之间的关系

从微观解释的角度出发，对社会景气与社会信心状况的观测以个体主观感受为基础。如果忽视主观感受或主观表达的微观机制，则阻碍了从微观基础向宏观事实的解释。戴维森 (Donald Davidson) 在关于主体行动与行动原因的论述中指出，对于行动的合理化，需要确定主体的行动意愿。例如主体采取 X 行动，是因为他期望并相信如此行动能够带来其所期望的结果。在这里，主体行动的首要原因是期望与信念的交织，只有在期望与信念的基础上，才能将主体的行动合理化。^① 这也就是说，在考察主体为何如此行动而非那般时，不能停留在行动层面，而是要追寻行动背后的原因。与主体的行动不同，主观态度的表达只是停留在心理感知和评价的基础上。在某种意义上，人们的这些主观感受本身就是行动的原因，也无需考察主体感受的具体原因，但以题器为指涉对象和评判基点的主观态度表达却存在一定的微观机制。

从我们的研究主题和题器指涉对象出发，“预期—实现”的对比关系可以构成理解上述四个方面的微观逻辑机制。这种预期建立于两个层次：主体层次上，人们对

^① Donald Davidson, *Essays on Actions and Event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12.

自身发展、与他人关系以及社会环境状况都有一定的预期；结构层次上，历史文化、意识形态、制度环境等宏观因素所渲染和追求的发展目标，比如“不患寡而患不均”、“实现共同富裕”、“还老百姓一个碧水蓝天”等，则进一步影响和建构着人们的预期。预期的实现程度决定了人们如何感知与评判满意度、相对剥夺感以及对政府的信任度，而评判又进一步影响人们对未来的预期和社会信心。当然，这里有关人们的社会预期既不等同于托马斯强调的“理性预期”，因为个体既不可能是“全息”的，也不可能完全依据理性原则进行预期与判断；^①也不等同于默顿所谓的“自我实现预言”，因为人们有目的的行动导致的非预期性后果不仅难以预期而且也难以构成人们可理解范畴的一部分。^②在这里，人们对可指涉对象的预期目标与目标实现程度之间的对比关系很难量化到一定的比例，但差异程度却成为人们进行相关社会问题评判的“模糊”标准（参见表1）。

表1 社会预期与目标实现之间的对比关系

社会景气状况	预期	实现程度	现实状况判断	社会信心
满意度	增长	未变	降低	降低
	不变	减弱	降低	
	增长	增长较慢	降低	
相对剥夺感	增长	未变	增强	降低
	不变	减弱	增强	
	增长	增长较慢	增强	
对政府信任度	增长	未变	降低	降低
	不变	减弱	降低	
	增长	增长较慢	降低	

1. 社会景气及其测量

满意度是人们在心理层面的一种主观感受，其既反映个体的福祉状况，也反映出人们对自身所处社会环境的满意程度。从预期—实现对比机制的角度，当人们行为的努力不能实现或者部分实现预期目标的时候，就会产生不满意的感受。预期目标的实现程度愈低，人们的满意度也会愈低。在一定程度上，人们对自身及其所处社会环境的满意度能够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出一个社会的发展状况，一个景气的社会必定是一个人们满意度水平较高的社会，这种预期与实现的对比关系则成为勾连微观个体与群体及社会宏观状况的评判机制。

① 参见陆建新：《理性预期理论述评》，《社会科学战线》1996年第1期。

② Robert K. Merton, "The Unanticipated Consequences of Purposive Social Ac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1, no. 6, 1936, pp. 894-904.

相对剥夺感主要是指人们从期望得到的和实际得到的差距中、特别是与相应参照群体的比较过程中所产生出来的一种负面主观感受，一种不满和愤慨的情绪。^①在这里，“相对剥夺感”不同于“绝对剥夺”，其体现的是一种与参照群体比较之后，对自身经济地位与社会地位变化的负面感受。所以，相对剥夺感在个体层面反映的是相对地位的变动，但其在深层次上反映的是一个社会的发展变动状况。变动剧烈的社会，人们更加敏感于自己的得失，无论是客观的社会分层还是主观的经济社会地位变动都能在人们的主观意识中显现出来，而相对剥夺感的变化可以较好地反映这种分层意识或不平等意识的变化。^②相对剥夺感的社会属性要强于满意度，有时甚至会带有想象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人们被相对剥夺感受的变化与整个社会的宏观氛围密切相关，也时刻会受到整个社会结构及其文化气氛变迁状况的影响。一旦人们认为自身的经济社会地位与参照群体直接相比较低或间接相比较低，都会产生相对剥夺感。从预期—实现的对比机制出发，人们对自身经济社会地位的变化会有一个预期，一旦与参照群体比较后发现自身预期未能实现或实现程度较低时，相对剥夺感就自然产生，差距越大，相对剥夺感越强。

政府信任是人们对政府行为绩效以及执政能力的一种肯定与社会承认，是对政府所做相应制度安排的评价，同时也是人们对政府行为绩效以及对政府行为预期与实现状况之间关系的评判。政府信任涉及的是政治信任的核心议题，即政府执政的合法性和政策执行的有效性问题。就合法性而言，对政府的信任程度反映了一个国家（或地方）的政府及其行为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了一般民众的认可；对于政策执行的有效性而言，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过低则意味着政府行为丧失了民众基础，从而使得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会遇到更多的阻力和反对，需付出更大成本。^③从预期—实现逻辑出发，对政府的信任度高低取决于政府所制定的相应制度安排和政策措施、政府提供的社会公共服务、政府履行的社会责任和社会义务以及政府的社会管理是否达到人们的预期。这些都直接或间接影响人们对政府的信任、政府的权威以及政府行为的合法性。

如前所述，由于满意度、相对剥夺感和对政府的信任度三项指涉性概念既有各自的理论侧重点，又相互交织，所以需要更进一步明晰三者之间的关系。

首先，对社会景气的测量主要是基于以下两个基本事实。一个是人们对其所处

① 参见 Robert K. Merton and Alice S. Rossi, “Contributions to the Theory of Reference Group Behavior,” in Robert K. Merton, ed.,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68, pp. 287-339; Ted Robert Gurr, *Why Men Rebel*,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0, pp. 132-179.

② 刘欣：《相对剥夺地位与阶层认知》，《社会学研究》2002年第1期。

③ 马得勇：《政治信任及其起源：对亚洲8个国家和地区的比较研究》，《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7年第5期。

的社会宏观与微观环境有着直观的感受。一般的公众可能说不清一些大道理，但他们可以从日常的生活中实实在在地感受满意不满意、认可不认可、得失与变化。另一个是政府作为国家机器和公共资源的管理者、分配者，其最重要的职责就是要用尽可能公平、公正和透明的方式提供与分配公共物品，满足公众的需求与期待。在这里，人们可以直接感受与评估的，不仅是这些公共物品的数量与质量，而且还有提供这些产品与服务的方式与过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人们的满意度还是相对剥夺感都会与政府及其行为发生关联。

其次，从实质上说，社会发展的根本目标是大众的福祉，是国家与政府尽最大努力、最大限度地去满足大众日益增长的需求与期望的过程。恰恰在这个意义上，社会的发展程度与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大众息息相关。如果说社会发展的基本要求是公平公正，那么，公众对社会发展环境的满意度与相对剥夺感，可以直接或间接地评判国家与政府满足大众需求与期望的质量与水平，也可以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出社会发展的质量与水平。

再次，如果说福祉与公平是带有普遍价值目标的一种发展追求，那么，社会包容则是用来实现上述两种价值的主要机制。^①这种机制的实现要求发展过程中的制度安排要兼顾、整合不同利益群体的各种不同诉求，同时要尊重发展过程中不同利益群体的差异。在一个发展中的社会，当国家与政府不能按照包容性原则公平公正地分配各种社会资源时，不同群体在比较的过程中就会不可避免地产生一种被绝对或相对剥夺的感受，人们的怨气以及相互之间的不满会在这种比较的过程中被放大，一种被“毒化”的社会环境就会在这种比较的过程中产生出来，群体之间的冲突也往往会发生在这种社会环境之中。所以，一个社会中满意度与相对剥夺感的高低，可以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出一个社会能否兼顾、整合不同利益群体的各种不同诉求，能否尊重发展过程中不同利益群体的差异，以及能否公平公正地分配社会的各种资源。

最后，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在其发展的过程中，政府在资源的组织、动员与分配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政府的这种资源动员、组织与分配的能力，不仅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政府对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可控性和稳定性，避免了社会的分裂和对抗，^②而且，长期以来政府在其行为过程中所形成的权威以及人们对政府所形成的信任，也使得政府对社会进行有效治理有了一个根本的前提保证。在这个意义上，对政府的信任度不仅是政府执政合法性和有效性水平的体现，同时也能够以此有效

①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社会发展与社会态度研究”课题组：《社会发展的四个理念》，第3—19页。

② 华生等：《中国奇迹的源头与动力何在》，2008年12月8日，<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23524/?print=y>，2014年10月15日。

观察政府与民众的关系是否和谐有序。离开了政府，一个社会的发展就失去了组织者，发展的过程就不会有序、高效；离开了公众，一个社会的发展就失去了基础和动力，发展就会中断。

2. 社会信心及其测量

关于社会信心，学界并没有一致的概念认定，依据信心所指涉对象的不同则有着不同的具体含义，比如消费信心、认知信心等。有研究将社会信心理解为公众信心，定义为一种能够使公众相信某一事物（目标）未来可以实现的心理力量，指公众对某一行动主体、某一事物、某个具体对象的一种认可、信任的心理状态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稳定的心理期望。^① 有研究者把社会信心理解为三个相互整合的层面：即对国家政权的信心、对自身所处社会的信心和对社会中自我的信心。其中，个人对自我的信心是基础，横向延展出去形成对社会的信心，纵向攀升而上则是对国家政权的信心。^② 从社会信心的影响结果而言，信心不足会延滞人们的预期行为或者改变行为取向，社会民众总体的信心会出现不足或溃散，进而影响整个社会的发展前景。正因为如此，有研究者在对金融危机的社会后果进行分析后指出，社会信心的不足成为经济风险发生和扩大的助推器，当一个国家或社会遭遇经济危机之时，重建民众社会信心成为走出危机的关键所在。^③ 从个人行动的社会性角度看，个人的决策既受到他人行为的影响，同时，在迅速变化的社会中，人们也会把宏观走势作为决策的依据。^④ 特定时段、特定群体的行为预期和社会信心状况会对其行为产生关键影响，进而对社会的发展形成积极或消极的后果。如“买涨不买跌”、“高储蓄、低消费”等都是在特定的结构环境下，由人们的行为预期和社会信心状况所引致的行为模式。

由此可见，社会信心既是一定时期民众的总体性心理预期，具有稳定性，但又易受经济社会等宏观结构环境变迁的影响；不仅是人们的主观心理表征，且会引导民众的行为，进而影响总体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在本研究中，社会信心强调的是对未实现状态的某种期望，是对某事物发生（或不发生）的预期和欲求。同时，社会信心的变动状况从另一个层面反映出当下社会的发展状况，是人们对当下状况评判的基础上产生的。所以，对社会景气与社会信心的研究就成为对一个社会发展状况进行观测、且相互勾连和互为条件的两个维度。一个社会的景气状况决定了人们的社会信心。从预期—实现对比机制出发，预期目标的实现程度越高则对未来的预期越高，反之则低；社会发展状况愈景气，则社会信心愈充

① 朱力：《公众信心聚散的社会心理学解读》，《人民论坛》2013年第5期。

② 褚松燕：《公众信心聚散机理与重塑对策》，《人民论坛》2013年第5期。

③ 孙立平：《金融危机的逻辑及其社会后果》，《社会》2009年第2期。

④ 刘世定：《危机传导的社会机制》，《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2期。

足，反之则匮乏。

为了进一步对社会景气与社会信心概念进行操作化与测量，我们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选择了表2所列题器进行量表构建（对量表的信度和效度分析以及指数的构建方法详见下文）。

表2 社会景气与社会信心概念的测量指标

对社会事项的满意度/信心度量表		相对剥夺感量表	
stg_1/ scg_1	社会风气	rd_1	与单位内同事相比的经济收入
stg_2/ scg_2	就业机会	rd_2	与单位内同事相比的社会地位
stg_3/ scg_3	社会公平公正	rd_3	与社会上他人相比的经济收入
stg_4/ scg_4	食品安全	rd_4	与社会上他人相比的社会地位
stg_5/ scg_5	治安状况	政府总体信任度量表	
stg_6/ scg_6	社会保障水平	bgg_1	政府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
stg_7/ scg_7	医疗服务水平	bgg_2	政府服务是否能够征询民意
stg_8/ scg_8	教育水平	bgg_3	政府服务是否公道
stg_9/ scg_9	物价水平	bgg_4	政府服务是否能让民众得到实惠
stg_10/ scg_10	基础设施	bgg_5	政府服务是否贴近民众需要
stg_11/ scg_11	环境质量	政府职能部门信任度量表	
对个体事项的满意度/信心度量表		bgd_1	城管部门
sti_1/ sci_1	个人收入水平	bgd_2	信访部门
sti_2/ sci_2	家庭经济状况	bgd_3	社会保障部门
sti_3/ sci_3	住房状况	bgd_4	工商（税务）部门
sti_4/ sci_4	健康状况	bgd_5	公安局（派出所）
sti_5/ sci_5	工作状况	社会景气/社会信心量表	
sti_6/ sci_6	生活压力	rd	相对剥夺感
sti_7/ sci_7	家庭关系	stg/scg	对社会事项的满意度/信心度
sti_8/ sci_8	人际关系	sti/sci	对个体事项的满意度/信心度
sti_9/ sci_9	社会地位	bgd	对政府职能部门的信任度
sti_10/ sci_10	发展机会	bgg	对政府总体信任度

三、量表检验与指数构建

对社会景气与社会信心进行理论界定与操作化之后，我们将使用全国性的抽样调查数据对文章构建的指标与量表进行统计检验，以验证理论逻辑与社会事实基础之间的契合性及研究的可行性。然后在此基础上构建社会景气与社会信心指数，进一步描绘年度间的变动趋势。数据统计所使用的调查数据来自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

会发展战略研究院分别于 2012 年、2013 年和 2014 年组织实施的“中国社会态度与社会发展”问卷调查。^①

(一) 指标的信度和效度检验^②

1. 对社会景气量表的检验

验证性因子分析的结果显示(参见表 3)，“相对剥夺感”因子的信度系数为 0.82，“对社会性事项满意度”的信度系数为 0.80，“对个体性事项满意度”的信度系数为 0.86，“对政府职能部门信任度”的信度系数为 0.78，“对政府总体信任度”的信度系数为 0.74。从这五个二阶因子来看，测量模型具有比较高的信度系数。就整个测量模型而言，社会景气量表的信度系数降低，为 0.74，主要是因为“相对剥夺感”因子在社会景气上的载荷偏低，需要我们在将来的研究中进行调整。总体而言，研究所设计的量表具有较高的稳定性与一致性，能够较为可靠地测量所预设的社会景气程度。

① 2012 年和 2013 年的调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分县市人口统计资料(2010 年)》(公安部治安管理局编)基础上制定了抽样框，目标总体为中国大陆直辖市、地级市、县级市中居住在社区(居委会)辖区中的 16 岁及以上人口。调查采取多阶抽样设计，其中县级行政区划(市辖区、县级市)为一级抽样单位(PSU)，社区(居委会)为二级抽样单位(SSU)，家庭户作为三级抽样单位(TSU)，最终抽样单位为个人(USU)，在考虑设计效应和回答率的条件下将样本量设定为 8100。2014 年的调查在目标总体、抽样方法、各层抽样规模以及样本量设定上都与前两个年份一致，不同的是，为了更为准确地反映目标总体，调查的 PSU 抽样框来自 2010 年由国家统计局实施并发布的《第六次全国普查(分县)数据》。但考虑到 2010 年距今已经有 4 年之久，为了校正人口变动的效应，我们根据六普数据中的分性别、分年龄的粗死亡率对 2010 年人口普查数据中的 12 岁及以上城镇人口进行了死亡率校正，以校正后的数据作为 PSU 的抽样框(包括 1226 个 PSU)。SSU 抽样框来自 2010 年国家统计局《第六次全国普查数据》的原始数据，国家统计局相关部门提供了 2010 年 SSU 的户数和 12 岁及以上城镇人口数。每个年度抽样的程序都保持一致：首先根据概率与人口规模成比例的抽样原则(PPS 抽样)，在中国大陆除西藏和新疆之外的地区中抽取 60 个市/区作为初级抽样单位；然后在每个抽中的 PSU 中随机抽取 9 个社区/居委会，共 540 个居委会；在每个抽中的社区/居委会中按定距方式抽取 15 个家庭户，共 8100 户；在每个抽中的家庭户中，使用 kish 表抽取 16 岁及以上受访者 1 人。

② 此处对量表的信度和效度检验使用的是 2013 年的调查数据。我们考虑，调查量表是测量社会景气与社会信心状况的“尺子”，唯有“尺子”及其刻度保持一致才能准确度量不同年份间的变化，从而没有必要对每个年份的数据逐一进行检验。由于 2012 年是我们调查的起点，2013 年的调查根据上一个年份的数据结果和研究的需要，对某些题器进行了微调，在此基础上使用题器固定下来的调查数据再次进行量表的检验就能够更为清晰地展现所设计量表是否具有简单、敏感、稳定和便于操作的特性。

表3 社会景气量表的验证性因子分析

	因子负荷估值 (标准化) λ_i (标准误)	残方差 (θ_{ii})	题器信度系数 ① $\frac{\lambda_i^2}{\lambda_i^2 + \theta_{ii}}$		因子负荷估值 (标准化) λ_i (标准误)	残方差 (θ_{ii})	题器信度系数 $\frac{\lambda_i^2}{\lambda_i^2 + \theta_{ii}}$
相对剥夺感量表 (信度系数 0.82)				对个体事项的满意度量表 (信度系数 0.86)			
rd_1	0.72 (0.01)	0.48	0.52	sti_1	0.68 (0.01)	0.54	0.46
rd_2	0.72 (0.01)	0.49	0.51	sti_2	0.75 (0.01)	0.44	0.56
rd_3	0.77 (0.01)	0.41	0.59	sti_3	0.67 (0.01)	0.55	0.45
rd_4	0.73 (0.01)	0.47	0.53	sti_4	0.58 (0.01)	0.67	0.33
对社会事项的满意度量表 (信度系数 0.80)				sti_5	0.60 (0.01)	0.65	0.36
stg_1	0.46 (0.01)	0.79	0.21	sti_6	0.59 (0.01)	0.65	0.35
stg_2	0.51 (0.01)	0.75	0.26	sti_7	0.50 (0.01)	0.75	0.25
stg_3	0.39 (0.01)	0.85	0.16	sti_8	0.57 (0.01)	0.67	0.33
stg_4	0.52 (0.01)	0.73	0.27	sti_9	0.56 (0.01)	0.68	0.32
stg_5	0.51 (0.01)	0.74	0.26	sti_10	0.67 (0.01)	0.55	0.45
stg_6	0.54 (0.01)	0.71	0.29	对政府总体信任度量表 (信度系数 0.74)			
stg_7	0.51 (0.01)	0.74	0.26	bgg_1	0.65 (0.01)	0.57	0.43
stg_8	0.56 (0.01)	0.69	0.31	bgg_2	0.65 (0.01)	0.58	0.42
stg_9	0.59 (0.01)	0.65	0.35	bgg_3	0.56 (0.01)	0.69	0.31
stg_10	0.45 (0.01)	0.80	0.20	bgg_4	0.62 (0.01)	0.61	0.39
stg_11	0.60 (0.01)	0.64	0.36	bgg_5	0.50 (0.01)	0.75	0.25
对政府职能部门信任度量表 (信度系数 0.78)				社会景气量表 (信度系数 0.74)			
bgd_1	0.48 (0.01)	0.77	0.23	rd	0.30 (0.01)	0.91	0.09
bgd_2	0.68 (0.01)	0.54	0.46	stg	0.78 (0.01)	0.40	0.60
bgd_3	0.73 (0.01)	0.47	0.53	sti	0.61 (0.01)	0.63	0.37
bgd_4	0.68 (0.01)	0.53	0.47	bgd	0.64 (0.01)	0.59	0.41
bgd_5	0.63 (0.01)	0.61	0.39	bgg	0.65 (0.01)	0.58	0.43

① 在验证性因子分析框架下，常用的量表信度系数 Cronbach 的 α 值不能恰当地拟合指标和因子间关系，从而采用 Raykov 的信度系数 ρ ，其计算公式为： $\rho = \frac{u^2}{u^2 + v}$

$\frac{(\sum_{i=1}^k \lambda_i)^2}{(\sum_{i=1}^k \lambda_i)^2 + \sum_{i=1}^k \theta_{ii}}$ ，其中 λ_i 是第 i 项题器的因子载荷， θ_{ii} 是第 i 项题器的残方差。（参见

Tenko Raykov, "Analytic Estimation of Standard Error and Confidence Interval for Scale Reliability," *Multivariate Behavioral Research*, vol. 37, no. 1, 2002, pp. 89-103)

在信度测量的基础上，进一步对量表的效度进行检验，以查看所设计量表的正确性，即能否真正反映我们所要观察的社会景气特征。^① 在调查中，有一项题器可资用来对社会景气量表的效度进行检查，这项题器询问受访者“对社会整体发展水平的满意度”，答案分为“很满意”、“较满意”、“一般”、“较不满意”和“很不满意”五个层级。如果每个量表的测量结果与人们对社会发展水平的满意度状况相一致，我们就可以认为所设计的量表具有较好的效度。结果如图 2，无论是社会景气因子还是各项子因子，都与人们对社会发展水平的满意度态势相一致，证明我们所设计的社会景气量表具有较好的效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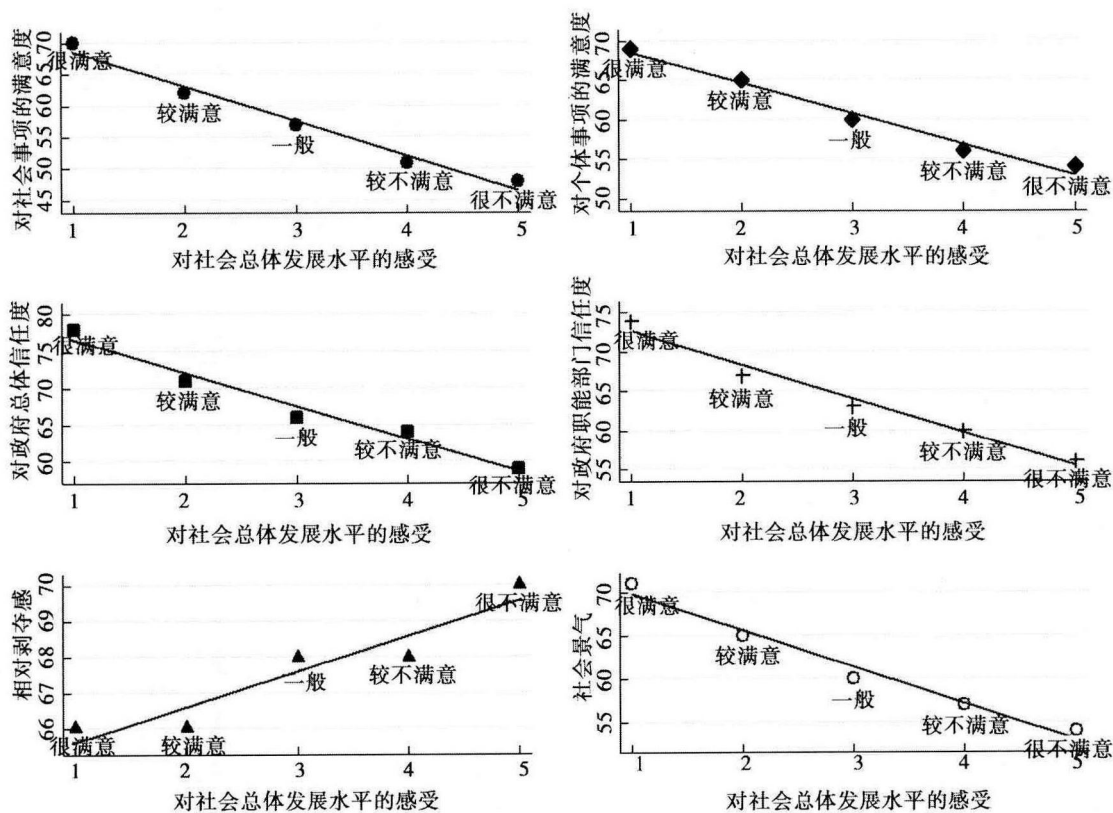


图 2 社会景气状况与人们对社会总体发展水平的感受

2. 对社会信心量表的检验

与前述对社会景气量表的测量相同，我们同样从信度和效度两个层面对社会信心量表进行检验。首先，从信度检验的结果来看（参见表 4），无论是“对社会事项的信心度”还是“对个体事项的信心度”，都具有很高的信度，社会信心因子的信度系数同样较为理想（0.68）。这表明，所设计的量表具有较高的稳定性和可靠性来测量人们

^① 关于信度与效度间的关系，存在以下四种：（1）信度低，效度必定低；（2）信度高，效度未必高；（3）效度低，信度有可能很高；（4）效度高，信度必然高。也就是说信度是效度的必要条件，效度是信度的充分条件。

对社会的信心程度。对于社会信心量表的效度检验，仍然使用调查中的一项题器来进行。该题器询问受访者“未来三年，对社会发展水平的预期”，答案分为“变好”、“没变化”和“变差”。我们有理由认为，一个人们信心充足的社会，对未来社会的发展水平同样会持有较高的心理预期。结果显示（参见图3），在社会信心的两个层面，人们的信心水平与对社会未来发展的预期相一致，进而证明社会信心量表亦具有较高的效度，可以正确地测量人们的社会信心状况。

表4 社会信心量表的验证性因子分析

	因子负荷估值 (标准化) λ_i (标准误)	残方差 (θ_{ii})	题器信度系数 $\frac{\lambda_i^2}{\lambda_i^2 + \theta_{ii}}$		因子负荷估值 (标准化) λ_i (标准误)	残方差 (θ_{ii})	题器信度系数 $\frac{\lambda_i^2}{\lambda_i^2 + \theta_{ii}}$
对社会事项的信心度量表 (信度系数 0.80)				对个体事项的信心度量表 (信度系数 0.83)			
				sci_1	0.63 (0.01)	0.61	0.39
				sci_2	0.62 (0.01)	0.62	0.38
scg_1	0.51 (0.01)	0.74	0.26	sci_3	0.57 (0.01)	0.67	0.33
scg_2	0.50 (0.01)	0.75	0.25	sci_4	0.55 (0.01)	0.70	0.30
scg_3	0.38 (0.01)	0.85	0.15	sci_5	0.57 (0.01)	0.67	0.33
scg_4	0.52 (0.01)	0.73	0.27	sci_6	0.56 (0.01)	0.69	0.31
scg_5	0.53 (0.01)	0.72	0.28	sci_7	0.45 (0.01)	0.80	0.20
scg_6	0.47 (0.01)	0.78	0.22	sci_8	0.52 (0.01)	0.73	0.27
scg_7	0.54 (0.01)	0.71	0.29	sci_9	0.62 (0.01)	0.61	0.39
scg_8	0.55 (0.01)	0.70	0.30	sci_10	0.63 (0.01)	0.60	0.40
scg_9	0.60 (0.01)	0.64	0.36	社会信心量表 (信度系数 0.68)			
scg_10	0.51 (0.01)	0.74	0.26	scg	0.96 (0.01)	0.08	0.92
scg_11	0.56 (0.01)	0.69	0.31	sci	0.42 (0.01)	0.83	0.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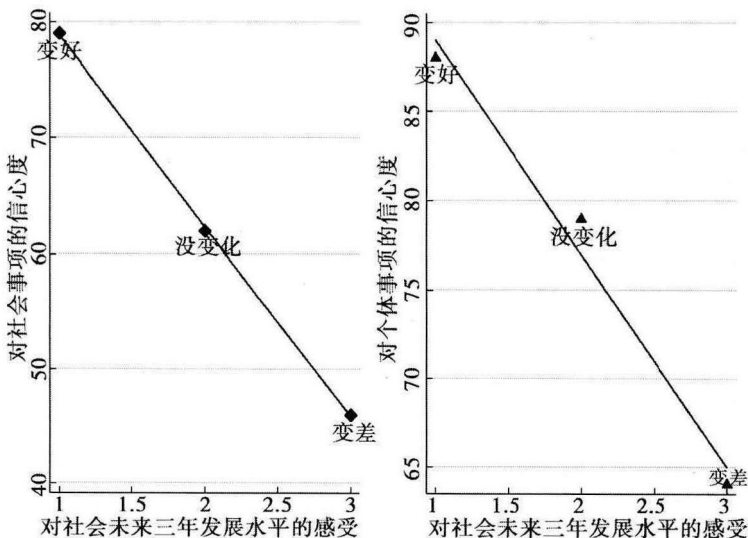


图3 社会信心状况与人们对社会总体发展水平的预期

(二) 社会景气与社会信心指数的计算

在对量表信度和效度检验的基础上,还需要对指数的构建进行论证。首先,对社会发展状况进行测度的量表及指数不仅需要在当年调查数据的基础上对社会发展状况进行评估,而且每次调查基础上的社会发展状况评估亦是一个纵向过程中的截面代表。在进行不同年份指数比较的过程中,量纲的统一是指数构建的一项关键因素。如果将量表和指数比做我们测度社会发展状况的“尺子”,那么尺子的刻度应是保持不变的,唯有如此,才能进行准确测量与比较。这同时也意味着,如果没有统一的量纲,每个年份的指数则失去了可比较的基础。其次,用以测度社会景气与社会信心的题器都是序次型的,虽然证实性因子分析的结果表明,量表的信度和效度较佳,但其只不过是在受访者回答基础上对调查数据分布结构进行的验证。如果要进一步构建指数,序次型变量向标准正态分布变量的转换就十分必要。因为,序次型数据只是告诉我们不同序次之间回答的比例分布,但其实质含义并不是调查数据的等距分布,从而需要对其进行标准化转换。

在明确需要对题器进行标准化转换和指数量纲统一的条件下,我们通过以下步骤建立指数:

1. 题器的标准化转换

根据正态分布的相关知识,可知,如果我们将受访者在每项题器上的回答比例假设为正态分布基础上的概率分布,那么根据如下正态分布公式:

$$\text{normal}(z) = p = \int_{-\infty}^z \frac{1}{\sqrt{2\pi}} e^{-x^2/2} dx, \text{ 求其逆函数便可得知每项回答比例在正态分}$$

布上的标准值。以三分题器为例,虽然我们能够求得其标准正态分布假设下的标准值,但是却难以确认分布两端的阈值。此处我们假设以 $0.1/N$ (N 表示样本量) 作为无限小接近于 0 的数,求得的标准值表示低端阈值;以 $(N-0.1)/N$ (N 表示样本量) 作为无限大接近于 1 的数,求得的标准值表示高端阈值,那么就构成了一个具有五项阈值表示的正态分布图(参见图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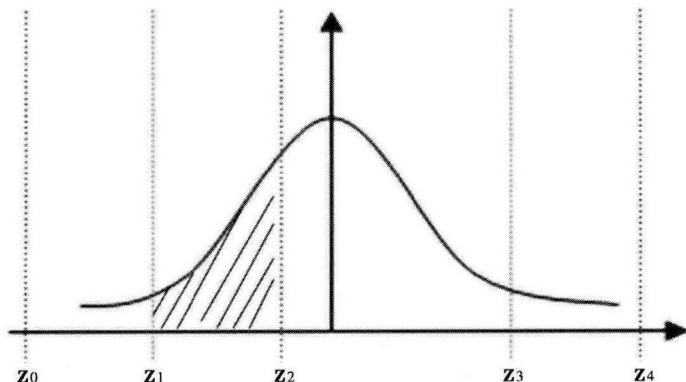


图 4 正态分布与阈值

虽然能够得到每项题器转换后的 z 值和阈限值，但这却不是我们所关心的，因为无论是 z 值还是阈限值都是标准正态分布意义上的。在将序次变量的类别假定为是变量在正态分布基础上的某种分类，那么在“还原”的过程中，阈限之间的区间所代表的意义才是我们最终关心的。此处借鉴科尔尼科夫和安吉利斯 (Kolenikov and Angeles) 的做法，^① 将阈限之间的区间看作是正态值与累计标准正态分布概率之间的比值，这一比值可以看作是区间“面积”在正态曲线上的映射，在某种程度上便具有了与题器得分相关的经验意义。

如图 5 所示，阴影部分的面积表示阈限值 z_1 和 z_2 之间的概率分布区间，那么 z_1 和 z_2 在正态曲线上的分值以及 z_1 和 z_2 累计标准正态分布的概率可分别表示如下：

$$f(x) = \frac{1}{\sqrt{2\pi}} e^{-x^2/2}$$

$$p(x) = \int_{-\infty}^x \frac{1}{\sqrt{2\pi}} e^{-x^2/2} dx$$

这一阴影区间可转化为如下比值的表达：

$$[f(z_1) - f(z_2)] / [p(z_2) - p(z_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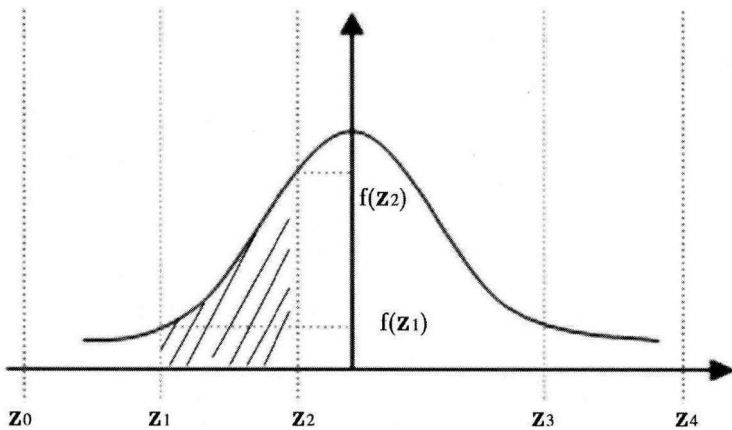


图 5 正态分布与阈限区间

2. 指数的生成

在考虑各项指标权重的条件下，^② 社会景气与社会信心二级指数的计算公式如下：

① 参见 Stanislav Kolenikov and Gustavo Angeles, “The Use of Discrete Data in PCA: Theory, Simulations, and Applications to Socioeconomic Indices,” Conference Paper of the Joint Statistical Meetings, 2004.

② 对指标权重的计算，我们依据各项指标在潜变量上的因子负荷大小而定，在此不再赘述。

$$\text{index} = \frac{\sum_{i=1}^k W_i \text{Indicate}_i}{\sum_{i=1}^k W_i}, i=1, \dots, k$$

其中, Indicate_i 表示第 i 项指标, W_i 表示第 i 项指标的权重。需要注意的是, 为了保持量纲的一致, 所有指标的权重均以 2012 年调查数据的结果为依据。社会景气与社会信心指数的计算依上述方式类推。

3. 指数的转换

在一般可理解的意义上, 借鉴韦克斯勒离差智商 (IQ) 的计算方式, 将社会景气与社会信心指数, 转换成均值为 100, 以 15 分值为层级划分的指数。公式如下:

$$\text{index_new} = (\text{index} - \bar{x}) \times 15/s + 100$$

(\bar{x} 是受访者在该指数上得分的均值, s 是受访者在该指数上得分的标准差)

以 2012 年为基准, 社会景气指数与社会信心指数均呈现不同程度的增长态势, 2014 年社会景气指数为 100.84, 对社会事项的信心指数为 100.78, 对个体事项的信心指数为 100.83。这一方面意味着, 民众对社会发展现状的满意度不断提升, 社会在总体上稳步发展; 另一方面也显现出, 民众对未来的发展趋势信心充足、预期良好 (见图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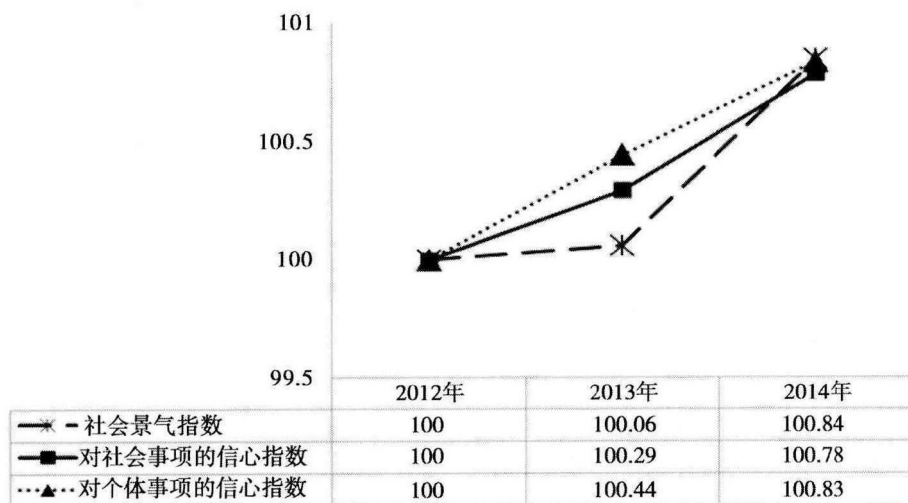


图 6 社会景气指数与社会信心指数的年度比较 (2012—2014)

四、结 语

本文将社会发展理解为一种理念, 即致力于人民福祉、社会公平、社会包容、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模式与路径, 并在此基础上, 提出通过“社会景气”与“社会信心”这两项表征民众“总体性情绪”的社会事实来观测与分析一个社会发展的总体状况与运行态势。

本研究的基本假定是，人们的主观感受能够反映出一个社会的客观现实；人们主观感受到的客观现实能够反映出一个国家社会治理的水平和社会发展的程度。本研究的基本判断是，一个发展状况良好的社会应该是一个景气的社会，也应该是一个人们对未来有着良好预期与信心充足的社会。在这个意义上，对社会景气状况与社会信心状况的研究正是试图达到把握社会发展“脉搏”，以“晴雨表”的方式反映社会发展状况的目标。文章强调个体层次上的主观态度一旦“化合”到总体性的社会情绪便具有了社会事实的特征。虽然社会景气与社会信心是人们某种主观态度的总体性体现，但反映的是整个社会结构是否整合有序、整个社会环境是否安定团结、整个社会方向是否顺应民意。

在理论辨析、概念操作化的基础上，我们通过全国性的抽样调查数据检验了研究所设计量表的信度和效度，数据分析结果表明，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然后，基于变量正态标准化转换和量纲统一的方法构建了社会景气与社会信心指数。统计结果显示，以2012年为基点，社会景气与社会信心指数呈现稳步的上升态势。

当然，这项研究只是对把握当下社会发展总体状况的一种初步尝试，对于如何将人们的主观感受与客观结构特征相关联，进而更为详细地阐述从微观社会态度向总体性社会情绪的机制转变，则需在后续的研究中进一步深入。对于如何使社会景气与社会信心指数真正做到“简单”、“敏感”、“稳定”且“易于操作”，还需要我们做更多的努力。

〔责任编辑：冯小双〕

cultural approach was that of a group who advocated an innovative Marxist synthesis pioneering the integration of the three streams of Chinese, Western, and Marxist thought. The founder of the “three streams become one” school, Zhang Shenfu, was the first to recognize and clearly express the spirit of the new age. From the “three streams become one” of the 1930s-1940s to the “innovative cultural synthesis” of the 1980s-1990s, and then, in the new century, to the formulation “Marxism as the spirit, Chinese learning as the substance, Western learning as the function,” the three statements clearly display the developmental laws, correct direction and actual road of Chinese culture in the past hundred years.

(3) Housing Models and Urbanization in China—Empirical Researc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nd Supply *Fan Jianyong, Mo Jiarwei and Zhang Jipeng • 44 •*

How are we to explain the active role of local government in China’s rapid urbaniz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why is it that the soaring price of city housing has not checked the constant inflow of migrants from elsewhere? We use a land supply perspective to investigate how local governments engage the internal mechanisms of urbanization, intervening specifically in the land market to increase the supply of land for industrial use at the expense of land for housing. Our entry point is the housing model choice of newly arrived permanent residents, which we use to build a spatial equilibrium model equipped to interpret Chinese urbanization with the help of both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empirical tests. It will be seen that the road of urbaniz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an be explained by a model involving the fact that the newly arrived permanent population lives mainly in low-priced housing outside the commercial market. The increased industrial use of land has driven an increase in the permanent population and raised urban house prices, but has lowered wages.

(4) Social Prosperity and Social Confidence in the Developmental Process—Constructing Concepts, Scales and Indices

Zhang Yan, Wei Qingong and Li Hanlin • 64 •

Characterizing the social fact of the sum of public sentiment in terms of social prosperity and confidence enables us to observe and analyze the overall circumstances and operational trends of social development and to reflect on and feel the pulse of social development by means of a “barometer.” The construction of measurement and observation instruments allows us to conduct tests using national survey data. The test results show th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the scales in our research design. On this basis, we can set up indices of social prosperity and confidence in a methodological construct based on the standardized conversion of normal variables and unified dimen-

sions. The statistical data indicate that, taking 2012 as a base point, indices of both social prosperity and social confidence showed a steady increase in 2013 and 2014.

(5) The Rational Interpreta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Judicial Credibility

Hu Ming • 85 •

In this age of We-Media, there has been a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the influence of public opinion upon judicial verdicts, leaving courts at the mercy of public opinion. Underlying this phenomenon is the problem of judicial credibility. As some influential lawsuits show, rational interpretation can identify, from amidst the variety of individual cases, the core factors affecting public assessment of criminal cases: both the internal factors centering on trust, reputation and interaction, and the external factors centering on transaction costs. A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of the degree of public trust, confidence and interaction with th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enables us to compare the differences in the public's understanding and that of grassroots legal officials, revealing that a low level of judicial credibility arising from judicial violations underlies rational choice. The current judicial reform must strive to remedy these gaps in awareness and must adhere to the concepts of the rule of law and respect for judicial rules, with a view to developing good relations between the public and criminal justice.

(6) The Legal Regulation of Internet Finance—A Perspective Based on Information Tools

Yang Dong • 107 •

Internet finance can satisfy the requirements of small and micro-investors and financiers, decrease transaction costs, encourage competition and improve market transparency, functioning to spread financial risks and bring finance back to its origins. However, China's control-oriented legislation has failed to regulate the credit risks of internet finance, fostering absolute payments and excessive reliance upon guarantees and thus restricting competition and worsening information asymmetry. We should therefore redefine the information tools paradigm to regulate market entry and clarify the legal status of market entities on the basis of big data and credit systems. This will give full play to the role of such tools in giving early risk warnings and legislating for investor protection as well as perfecting an integrated regulatory system of internet finance law. It will thus remedy the institutional mismatch between control-oriented legislation and gaps in the law as well as regulating credit risk and reducing systemic risk. This will encourage competition, boost information production and transmission, and facilitate risk diversification and utilization, thus allowing internet finance to perform its endogenous function of optimizing resource allocation.